

## 前言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勞動、土地等生產成本高漲，在成本壓力下，台商不得不轉移生產據點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內陸地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製造業龍頭鴻海集團子公司富士康，從2010年起陸續將生產據點從深圳龍華廠，遷移到河南鄭州、四川成都等內陸地區，其龐大的出口規模，使富士康的新據點往往貢獻當地內陸省分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馬紀朝、周芳、盧麗濤，2013）。

中國大陸台商的內陸遷移，引起國內部分學者與財經雜誌的關注。然而，這些研究對於中國大陸政府的產業轉移政策沒有較深入的分析，也因此無法幫助讀者瞭解中國大陸推動產業轉移的國家戰略規劃；再者，這些研究與媒體報導對於內陸地區的台商經營模式著墨較少，尤其是近年來內陸台商面對招工難問題所進行的企業轉型，幾乎沒有國內文獻進行討論。

為了能夠幫助國內產、官、學界理解：(1)中國大陸政府的產業轉移政策；(2)搬遷到內陸地區台商的經營模式；(3)台商沿海與內陸生產據點的分工與互動；

(4)內陸台商的轉型，本研究筆者在2011年夏天前往湖南省郴州市進行約10天的田野調查，2015年夏天在湖南省湘南三市（衡陽、永州、郴州）進行2週的田野調查<sup>1</sup>，分別深度訪談了11家與22家企業的負責人或專業經理人<sup>2</sup>。這兩次田野調查其間，研究者也訪談了湖南省商務廳、湖南省台辦、湘南三市的商務局、台辦幹部，對於省級與市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與活動進行瞭解。

本研究調查發現，移轉到內陸的台商，依照其不同需求，與沿海舊有據點有著多樣的分工模式，並且比較2011年與2015年的兩次調查結果發現，由於近年內陸也發生招工難的問題，內陸台商積極採取自動化、優遇勞工等方式進行轉型。此外，目前中國大陸的產業轉移政策，中央政府並沒有提供特別優惠，且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可能因會中央政府的政策風向而一夕消失，因此，台商在轉移至優惠政策較多的內陸地區時必須考量風險問題。本研究架構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節將說明國內、外對於產業轉移的學術研究成果（重視管理實務的讀者，可以忽略此段）；第三節將說明中國大陸政府的產業轉移與招

1 這兩次調查，承蒙湖南省台辦、郴州市商務局幫忙許多，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兩次田野調查間隔4年，主要是第一次調查之後，2位筆者因為擔任行政職及轉換任教大學等私人因素延誤了第二次田野調查。然而，我們卻認為這樣的延誤，是誤打誤撞得出更好的研究觀察。因為在2011年時，正是產業轉移的熱潮，但到了2015年，卻已經觀察到有廠商從湖南再移轉到東南亞的現象，若第二次田野調查是在第一次調查隔年的2012年實施，恐無法觀察到企業轉移到湖南，再從湖南轉到東南亞的現象。

2 第一次田野調查由第一筆者單獨完成，第二次田野調查由2位筆者共同完成。第一次訪談11家企業中，台資企業5家，陸資企業4家，港資企業2家；第二次訪談的22家企業中，台資企業14家，陸資企業7家，日資企業1家。

商優惠政策；第四節與第五節將以兩次田野調查資料為本，分析內陸台商的經營模式與近年來的轉型；第六節結論將整合本研究論點，並對國內產、官、學界提出政策建言。

### 關於產業轉移的學術研究

關於產業轉移的議題，國內關注的學者不多，較正式的學術出版著作，就筆者所瞭解，分別是以中國大陸勞動統計資料進行內陸缺工潮分析的郭永興(2013)，以及鄧建邦教授以台商內陸遷移為關注焦點的英文專書論文(Deng, 2015)。鄧建邦的研究指出，過去沿海台商的軍事化管理，在內陸地區不能施用，因為內陸工廠的員工都來自附近區域，與當地社會有緊密的連結，台商必須以人性化的管理才能被當地社會接受。另外，在介紹中國大陸情勢的期刊（如《展望與探索》）中，也有一些關於台商、港商往內陸遷移，或中國大陸內陸地區投資環境分析之探索性與介紹性的文章，例如，朱言明(2010)、朱柔若(2012)、梁廣榮(2008)、蔡宏明(2010)，但這些介紹性文章，往往缺乏遷移企業的經營模式分析。除了上述國內學界研究外，針對產業轉移的議題，以下分別針對中國大陸及國際學界的分析進行說明。

#### 中國大陸學界的討論——產業梯度轉移

近年來，中國大陸本土學界對於中國大陸沿海製造業內陸遷移之議題相當關注。中國大陸學界大多以「產業轉移」或產業「梯度轉移」（關於梯度轉移的理論意涵，稍後解釋）的觀點進行分析研究，

並早在中西部經濟成長尚未加速的2000年中期以前，就已經開始關注此議題。

2000年中期之前中國大陸學界或行政官僚（多為中西部地區的地方官僚）對於產業轉移的分析，大多是出自於對東部沿海地區因為外資投資而經濟快速成長的憧憬，希望外資能夠移轉投資到中西部地方（李小建、覃成林、高建華，2004；袁長惺、胡西林，2001；彭道賓，2003；鄭寧，2003；戴宏偉、馬麗慧，2002）。

2000年中期以後，隨著外資製造業轉移的增加，中國大陸學界對於「產業轉移」或「梯度轉移」的研究也日益增加。關於產業轉移的研究，中國大陸學界在2000年中期前後，曾發生過肯定論與懷疑論的論爭（李國政，2011）。肯定論者認為，沿海發達地區經過20年以上的快速發展，已經到了從勞動密集產業為主的階段過渡到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為主的階段。沿海發達地區由於勞工成本高，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逐漸喪失，必然要向勞動成本低廉的地方轉移（袁長惺、胡西林，2001）。懷疑論的學者認為，東部的企業群聚效果難以被中西部的勞動力優勢所取代。例如，任太增(2001)就指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使要素的豐缺程度對國內不同地區比較優勢的影響度大為下降。劉艷(2004)認為，產業集群是東部經濟增長與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中西部地區難以抗衡，東、西部地區不合理的區域分工會加強，東西差距會進一步擴大。謝麗霜(2005)也認為，產業轉移在中國大陸沒有實現，東部發達地區在歷經20餘年的發展與繁榮之後，其勞動密集產業並沒有像人